



从南洋到北大的人生轨迹 五

回国“落地生根”纪实 赖荣源

十年寒窗

我在北大学学习和工作近四十五年期间，碰到过许多美好机遇，这些机遇在社会大环境变动的不同时期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命运和结果。我在北大的“前半生”，即1956年至1976年的二十年中，经历了反复折腾的十年寒窗生活和十年文革动乱，许多美好的机遇在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往往成了遭遇，陷于屡遇屡失的命运。我在北大的“后半生”，即1977年至2001年改革开放后二十五年期间，终于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一系列弥足珍贵的迟来机遇，演绎了我“后半生”晚成的教书生涯。

2018年北京大学建立120周年之际，我曾在专设的北大在线校庆留言栏上表达对母校深切感恩之情：“在北大学习和工作期间，我有幸曾是北大经济系（学院）唯一的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当年作为年轻的归侨学子都有一个青春梦想，就是‘北上归国深造，参加祖国建设’，而北大是我实践这个梦想的坚实平台，铸就了我一步一个脚印，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同祖国共呼吸同命运的人生轨迹。”

1956年我在“向科学进军”的感召下，心中抱着将来争当一个“苏式副博士”的理想，

考入北大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开始大学学习生活。不料在良师教导下埋头读书的情境持续不到一年，1957年春夏之交全国就掀起了疾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运动，北京大学成了这场政治运动的重灾区。我生平第一次突然面对这样猛烈的政治运动，毫无思想准备，对反右派运动很不理解，在相当时期内抱有很大的抵触情绪。我对当时校内外处理所谓右派言行有不同的看法，认为他们在鸣放期间的言行，并没有按照原定的“助党整风”的精神区别对待和具体分析，而是一概断定为具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乃至反革命性质和反动主观动机。我认为这有先入为主，主观失实之嫌，进而认为反右派斗争的辩论和批判会缺乏以理服人的精神，没有贯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方针，有以势压人，一棍子打死之虞。

我对反右派运动抱有的抵触情绪和保留态度直至反右派斗争后期未能得到克服，陷入了思想矛盾的漩涡而不能自拔。此时我想到了著名作家高尔基小说里的一个故事，一个叫丹柯的青年身陷大灾难中，手里拿着自己那颗燃烧的心，寻找走出黑暗森林的求生之

路。后来通过阅读苏联著名作家阿·托尔斯泰的小说《苦难的历程》和被列宁誉为“艺术巨匠”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著《怎么办？》也收到相关的深刻启示和影响。前者描述四个性格不同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们的个人幻想开始破灭，在动荡的年代里各自有着曲折复杂的探索 and 追求。他们经历“苦难历程”，经受革命锻炼，与人民相结合，逐渐领悟社会主义伟大真理，终于跳出个人感情和愿望的狭隘圈子，在同国家和人民的结合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真正的幸福。《苦难的历程》也是作者的良心所经受的一段痛苦、希望、喜悦、失望、颓丧和振奋的历程，是对于整整一个巨大时代的感受——“回家，到祖国之路”。另一部被列宁称为“真正的文学”的文学名著《怎么办？》正如其副标题“新人的故事”所提示的，小说中忠实描绘了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一群知识分子“新人”同旧世界决裂和不懈斗争，创造新社会生活的故事，是一部“能够教导人，引导人，鼓舞人”的“生活教科书”。

在反右派斗争中“陷入思想苦闷”之时，



2015年正中学校建立七十周年庆祝大会上向母校献礼（北大纪念品）

沉浸于阅读上述名著，冥冥之中我似乎融入到故事人物的思想与情感境界中，尤其是阿·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的扉页录下的题记：“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很令人震撼，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使我的内心深处滋生了求得精神解脱的强烈期求。我作为一个胸怀爱国之心，思想要求进步的归侨青年学子，渴望自己能够走出思想矛盾的漩涡，以求尽早丢掉思想包袱，跟上政治运动的发展步伐。为此，在当时开展的双反运动群众性自我思想检查活动中，我抱着真诚的心情响应“向党交心”的号召，坦然写了长达十四页万余字材料，如实地详细陈述自己的思想状况，以求组织的理解和帮助：“……认为自己年轻，回国后生平第一次碰到这样‘生动活泼’的运动，可以放任自己在这个运动中‘自由锻炼’”，“独立思考，力求自己明白事

理”，这样“满可以不去动手动嘴而只动脑筋，慢慢地仔细地思考问题，不忙做出对问题的看法和结论，干脆用自己的‘客观立场’去‘深入观察研究’大字报和辩论会”，“我完全沉溺于这些活动中，可以说那段时期是我有生以来思想特别活跃的‘日日夜夜’，在思考问题的思想矛盾中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我的思想活动基本上是陷于极度紧张、混乱，往往循环反复，有时已想清楚的问题，却突然又搞不通，而未解决的问题，却有时一下子就明白过来，总之是矛盾百出，至今是否已最后彻底解决呢？我实在不敢说是已解决了，因最近一个礼拜的思想又有些混乱，整理不出头绪。”正是这种思想状态促使我“在任何（辩论或批判）会上连一次掌也没鼓过，只是在一旁冷静地观察与思考双方的争论”；“由于思想上仍搞不通，所以我不愿在北大学生（关于积极投入到反右派斗争）致全